

AT

FOREIGNERS THINK OF
YUAN SHIKAI

袁世凯

汤伏祥 著

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说：“袁世凯可谓能矣！”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他名义上是共和主义者，但内心却是专制君主。”

美国传教士赫德兰认为，袁世凯是“为国家掌握航向”的人。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认为，袁世凯是“中国的未来”，是“唯一可以胜任的领袖”。

.....

让我们通过本书了解

当时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袁世凯

袁世凯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佐藤铁治郎

赫德兰

莫理循

朱尔典

丁格尔

芮恩施

辛博森

士 貴 我

世

凱

WHAT FOREIGNERS THINK OF
YUAN SHIKAI

K827.6/54

2008

袁 外
国

世 人
眼

凯 中
的

汤伏祥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佐藤铁治郎 赫德兰 莫理循 朱尔典 丁格尔 芮恩施 辛博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汤伏祥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218-05770-5

I. 外… II. 汤… III. 袁世凯(1859~1916)—人物研究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26529号

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

著 者 / 汤伏祥

出 版 者 /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 / 510102

责任编辑 / 倪腊松 杨小虹

封面设计 / 卢小雅 何 筠

责任技编 / 周 杰 黎碧霞

总 经 销 / 广东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印 刷 /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 11

插 页 / 2

字 数 / 320千

版 次 / 2008年5月第1版

印 次 /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 1-5000册

书 号 / ISBN 978-7-218-05770-5

定 价 / 22.00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37579604 37579695】

序

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对于袁世凯其人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生动活泼的热潮。其标志是：第一，发表和出版了数以百计的论文和著作，冲破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窃国大盗”的定式，做出了许多符合历史实际的、有价值、有意义的评论和介说。第二，先后出版（或影印、或标点整理）了一大批历史文献。其中包括未刊档案和稿、抄、孤本公私收藏，许多当时人物的文集，史料、资料专辑，乃至稀见史料笔记、报刊等等。大量的第一手史料的刊布，厘正了那些道听途说的不实传闻，想当然的臆断，以及无意的附会，有意的伪造。人们惊讶地发现，许多已经成为国人常识的成说和定论，竟然得不到史实的支持。第三，是境外当代学者以及时人著述的译介。它们成为打破学术界数十年闭目塞听、坐井观天的局面和僵化思维的模式，促进思想解放的润滑剂。

袁世凯所处的时代，外国人已经普遍介入中国社会。在目前林林总总的关于袁世凯的著述中，似乎缺少一种与其同时代的外国人综合评述袁氏的书。青年记者编辑工作者汤伏祥先生的《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可谓一个应时的新颖选题。作者在许多翻译书籍中，择取了佐藤铁治郎等七个东西方人士的著述，综合评介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心目中的袁世凯。这七个人中，有新闻媒体的记者，有传教士，有外交官乃至政客。他们都有相当的文化和思想品位与观察能力，长期居留中国，像辛博森已是父子两代了，有的还同袁世凯有直接的亲密交往，如朱尔典、芮恩施，莫理循还当了晚年袁氏的政治顾问。他们对袁氏的观察，颇具一定

的代表性。这些著作多系个人见闻，并非严肃的史籍，缺乏准确的史料依据，失实之处，在所难免。但是，这些外国人，有其与国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利益背景，他们的观察视角，对于信息的捕捉与判断、意义的理解，都有其特异的个性，因而对于袁世凯的评判也往往独具只眼之处。当然，在历史的关键问题上，时人与今人、国人与外人，也不乏一致与共识。例如，光绪末年，立宪运动兴起，已是权臣的袁世凯公然以倡导者自居，声言“官可不作，宪法不能不立”，“官可不作，法不可不改”（陶湘向盛宣怀的报告语）。在野的立宪派首领张謇，许袁如日本政坛的大久保利通、伊藤、板垣，“亿万宗社之福，四百兆人民之命，系公是赖”（张謇致袁世凯函语）。明尊袁为朝内立宪的领袖。而站在袁世凯对立面的人们则直指，袁是“立宪为名”，“暗移神器”（御史赵炳麟语）。安一个谋逆的罪名，这是古往今来置对手于死地的最狠一招。于是，“京中各衙门，无上无下，……茶寮酒市，所谩骂者皆袁氏也”（杨度《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之描述）。日本人佐藤铁治郎也说，“袁世凯身为汉大臣，充最重要之机关，握种种之大权，而又系出汉人，竟不畏满汉之嫌，及其他各种之障害，一意为国家谋生存，为人民增幸福。首倡立宪，以一身为怨府……”（《袁世凯》）如此等等。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有言：凡治“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其实，这也可谓治史论人的通则。汤伏祥先生的著述，展现了当时外国人对袁世凯言行的记述与评论这一个侧面，使后人不论读史者，或以历史研修为职业者，对于袁世凯其人的认识与研究，拓展了视野，开辟了另一个观察的角度，增添了人们对于袁世凯所处客观境界的了解，减少了对袁氏评论的隔阂与肤廓，这就是《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一书的作用与价值所在。

是为序。

骆宝善

2008年2月

目 录

佐藤铁治郎眼中的袁世凯（上） 1

佐藤铁治郎是日本的记者，时任天津《时闻报》社主，在中国、朝鲜居住约三十年，对袁世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袁世凯早期在朝鲜的种种表现，让日本人怀恨在心，也让日本人对袁世凯敬畏三分。佐藤铁治郎对袁世凯在朝鲜的表现甚为赞赏。

佐藤铁治郎眼中的袁世凯（下） 20

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后至被以足疾开籍回老家养病这段时间，是袁世凯后来攀登权力顶峰的资本积累期。袁世凯在这一时期，有练兵、兴学、推行司法改革、推行新政、主张立宪等。佐藤铁治郎对袁世凯的这些改革也是赞赏有加。

赫德兰眼中的袁世凯 40

赫德兰，传教士，其夫人是慈禧太后母亲、隆裕皇后的妹妹以及北京的许多格格福晋的家庭医生。1888年来华，亲眼目睹了清朝的最后岁月。他对光绪帝的维新改革多有批评，对袁世凯反倒有不少溢美之词。

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上） 57

莫理循是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与袁世凯交往甚密，对袁世凯多有赞美之辞。在辛亥革命暴发后，莫理循就不断鼓吹只有袁世凯是最适合担任总统职位的，称赞袁世凯治理国家的才能比中国当代的任何政治家都更高明。

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下） 76

莫理循出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成为袁世凯的得力助手。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中，对袁氏帮助甚大，但对其称帝甚为反感。另外，莫理循在揭露日本“二十一条”侵略野

心及促成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等问题上，有过贡献。

朱尔典眼中的袁世凯

93

朱尔典是袁世凯的老朋友，在朝鲜时就与袁世凯认识。后来，朱尔典出任英国驻华公使，与袁世凯的关系更加密切。辛亥革命后，更是竭力帮助袁世凯，对袁世凯谋取革命果实帮助甚大。

丁格尔眼中的袁世凯

112

丁格尔是英国传教士，同时也是新闻工作者、作家、旅行家，出版过不少关于中国社会的著作。武昌起义时，丁格尔正在汉口，作为英文《大陆报》的特派员，他广泛接触了交战双方的高层人物，对整个事件有独到的见解。丁格尔与黎元洪交往甚密，与袁世凯也有交往，对袁世凯、黎元洪等都有自己的看法。

芮恩施眼中的袁世凯

126

芮恩施是美国的学者、外交官，美国当时著名的远东事务权威之一。1913年到1919年任美国驻中国公使，与袁世凯有过交往。芮恩施作为威尔逊政府的驻华公使，他一面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感到不满，一面又在帮助袁世凯政府。这也正反映了当时威尔逊政府的对华政策。

辛博森眼中的袁世凯

144

辛博森的父亲曾任宁波中国海关税务司。辛博森1902年投身新闻业，先后任一些英国报纸驻北京的通讯员。辛亥革命后，任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北京记者。1916年，被黎元洪聘为总统顾问。辛博森赞赏黎元洪，而对袁世凯则多有批评。

后记

162

佐藤铁治郎眼中的袁世凯（上）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凌辱，让现在的中国人还感到气愤。明治维新后，日本得以迅速发展，窘困于岛的日本不满有限的国土，遂向外扩张，以求统治整个大东亚。日渐衰弱的中国自然成了日本的侵略目标。在无理的借口下，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后来还有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以至20世纪30年代的全面侵华，等等。这些是大的、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日常的对华政策也是不愿意看到中国前进、中国强大的。日本对中国的态度非常谨慎，当它看到中国出现曙光或者隐约有了曙光时，它就害怕起来，并通过各种手段，全力抑制中国发展——这在辛亥革命后有明显的丑陋表演。当共和政府顺利得以诞生后，日本就很不高兴，不希望中国走上民主的道路。当袁世凯获得稳固的政权后，日本就非常害怕袁世凯对其不友好，进而培植反对势力，加速了共和政权走向军阀混战。

近现代日本对中国的创伤是剧痛的，这是专门的论题，这里先不表，但日本对袁世凯复杂的心态却是不能不说的。日本和中国的第一次交锋，可以说是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与朝鲜存在“宗藩”关系。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力谋向外扩张，对朝鲜蠢蠢欲动。光绪二年（1876），日本借口船只在江华岛被击，强迫朝鲜订约，承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否定中国的宗主权，并对朝鲜进行经济侵略。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引起了中朝传统关系的变化，李鸿章为牵制日本，介绍美、英、德诸国与朝鲜订约，并由朝鲜自行声明为中国属邦，使中朝的宗藩关系获得国际的承认。也正是这样，朝鲜原本十分贫弱的王国更是被推到了国际的激浪中，加上宫廷权力的斗争，可谓危机重重。

朝鲜的危机，给了袁世凯以施展才华的机会，“袁世凯厕身军界，嚆矢于朝鲜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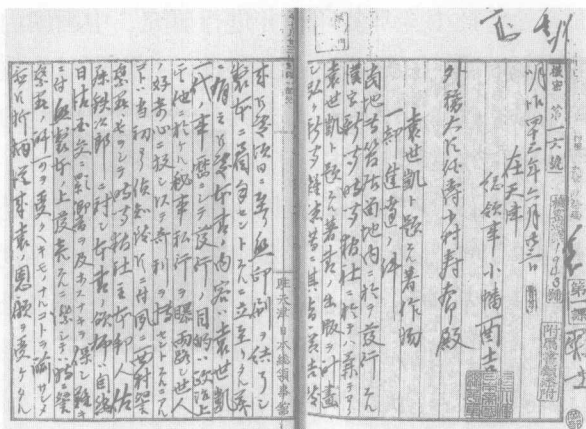


▲ 1767 年制
《大清万年一
统天下全图》

午之变”。^①光绪八年（1882），朝鲜在大院君李昰应煽动下，发生了壬午之变，掌权的王后闵氏遭围攻，闵氏党羽被杀。闵氏在洪在义的掩护下，乔装逃走。因闵氏政策多亲日，政变之兵遂袭击日本使馆，杀堀本礼造等日人。日使花房被迫率馆员走仁川济屋浦，乘英船回国。

日本政府得到花房公使自长崎发出的有关事变始末的电报后，便决定派兵到朝鲜问罪。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探知消息，即通电署理北洋大臣张树声。张闻朝警报，遂发檄吴长庆，带队赴朝，以靖朝乱。在吴长庆队伍中，即有袁世凯。袁世凯从此与朝鲜结下渊源，并在中日对朝鲜利益的搏斗、比拼中，和日本产生怨怼。因此，日本人对袁世凯的心态非常复杂，有痛恨袁世凯的一面，也有畏惧袁世凯，甚至有爱惜、赞赏袁世凯才华的一面。佐藤铁治郎就是这样一位日本人。

佐藤铁治郎，生平不详。据日本学者竹内实在《大正期的中国形象及袁世凯评价》一文介绍说，佐藤铁治郎似乎在中国与朝鲜居住有三十年之久，其中大约有二十年是作为新闻记者的生涯度过的。当时他可能在天津经营时闻报馆。②另据当时日本驻天津的总领事小幡酉吉给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呈递的报告中，有“时闻报社社主佐藤铁治郎”之字样。③佐藤铁治郎则称自己是“东瀛下士”，“谫陋不文，三十年回翔于日、清、韩三国之间”。④真是遗憾，对这样一位人物，后人没有过多的记载和考证，他的生平也无法得到进一步了解。只知道这位日本人，在1909年5月出版了有别于一般袁世凯传记的《袁世凯》一书。但就在该书印刷完毕、即将装订成册之际，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以及天津海关道的官员，还有其他的知情者，均认为此书的出版会影响中日两国关系，遂要求停止出版。袁克定以现金收买了本书的全部印刷物，并在两三天内由袁克定的代理人作证烧毁。但小幡酉吉却暗中保留了一本，并将它交给了日本外务省。由于《袁世凯》为孤本，倍为珍贵，20世纪70年代，日本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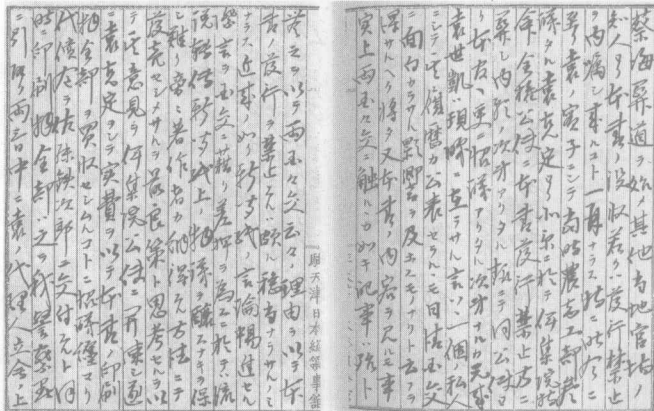


▲佐藤铁治郎
《袁世凯》影
印件之一

本驻天津的总领事小幡酉吉给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呈递的报告中，有“时闻报社社主佐藤铁治郎”之字样。③佐藤铁治郎则称自己是“东瀛下士”，“谫陋不文，三十年回翔于日、清、韩三国之间”。④真是遗憾，对这样一位人物，后人没有过多的记载和考证，他的生平也无法得到进一步了解。只知道这位日本人，在1909年5月出版了有别于一般袁世凯传记的《袁世凯》一书。但就在该书印刷完毕、即将装订成册之际，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以及天津海关道的官员，还有其他的知情者，均认为此书的出

▼佐藤铁治郎
《袁世凯》影
印件之二

版会影响中日两国关系，遂要求停止出版。袁克定以现金收买了本书的全部印刷物，并在两三天内由袁克定的代理人作证烧毁。但小幡酉吉却暗中保留了一本，并将它交给了日本外务省。由于《袁世凯》为孤本，倍为珍贵，20世纪70年代，日本方



面开始将此书全部复印，并进行研究，中国国内的读者也是近几年才看到复印本的。透过这些复印件，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佐藤铁治郎眼中的袁世凯是个什么模样，尤其是袁世凯在朝鲜的种种经历，以及在这其中所展现的形象。

前面说到，袁世凯是因为朝鲜壬午之变而赴朝的。时年二十三岁的袁世凯可谓血气方刚，豪气非凡。袁负责筹办军需供应补给之事。但袁显然不满足于自己的工作，当大军在登州进发时，袁世凯就跟朝鲜官员金允植说，他想提劲旅数百，直接入京城。金允植虽说到仁川后再见机而行为好，但对袁的魄力颇为敬佩，后两人交往甚为密切。

袁世凯入朝后不久，便因为严肃军纪而获得名声。清军入朝后，纪律很不好，不但任意抢劫朝鲜居民的衣服食物，而且强奸民女事件也有发生。袁世凯知道这样下去，必将引起朝鲜人民的反抗，也有失“上国”之体面，因此就力主整军。袁向吴长庆说明利害，同时自愿

担负这个责任。在吴长庆的支持下，袁世凯首先从各营抽调了一批比较优秀的官兵，组成一支执法稽查队。袁亲自率领，日夜巡查，遇到那些扰害人民的士兵，立刻就地正法，枭首示众。庆军经袁世凯整顿，“纪律一振，即袁爪牙辈亦大悚惧，韩境稍安，吴大奖袁能办事云云”。^⑤吴长庆大奖袁世凯的结果，就是向李鸿章密荐了袁世凯。李鸿章准吴所请，派袁掌管庆军营务处，遂有总辖三军之权，而袁世凯三字，遂达李之耳中。

光绪九年（1883），吴长庆回国，袁世凯揽过军权。当时的朝鲜有事大、独立两派。事大派亲华，以闵泳翊为首

▼年轻时的袁世凯



领；独立派亲日，以金玉均、朴永孝等为首。两派自分畛域，相互倾轧。光绪十年（1884），独立派在日本的阴谋策划下，发动甲申政变，企图铲除事大派，独占在朝之利益。独立派在日本公使竹添的支持下，遂刺杀事大派首领及六大臣。日本还挟持了国王到景佑宫，同时迫使国王招请日使进宫保卫。日使竹添遂率使馆之二中队入宫守卫。袁世凯知道后，很是激动，他一面做举兵的准备，一面致函旅顺的保龄，托他禀请“即派兵轮来东”，接着又上书李鸿章，请求派兵支援，以防不测。接着，袁世凯率兵进王宫，并致书日本公使竹添，谓：“敝军与贵部驻此，同系保护国王。日昨朝鲜内乱，杀害大臣八九人。现在城内外军民不服，举有入宫环攻贵部之说。弟等既恐国王复惊，又恐贵部受困，用敢率队进宫，一以保护国王，一以援护贵部，别无他意，务请放心。”^⑥袁函发出后，不见竹添答复，遂于当日下午，袁世凯断然发动攻击。袁自率一队进攻敦化门，吴兆有率队由宣仁门向昌德宫进军，张光前所部为预备队，在后策应。佐藤铁治郎在记录这一历史事件时，多有气愤，称：甲申之变，韩京大乱，韩王恐怖，照会我竹添公使保护。袁世凯闻变，遂率兵往袭王宫，以我公使在宫中，及致谢书我公使。“书甫人，我公使未暇拆阅而袁军已先鸣枪。时韩兵守宫门，我兵驻内院，清兵入门，先击毙韩兵数十人，继我军相接。清众我寡，势不敌。我公使势甚危。”^⑦

袁世凯的果敢，给日军以打击，营救出朝鲜国

▼朝鲜王宫





▲摄于美国费城
的李鸿章

王，竹添最后也逃往仁川。这是中日士兵在朝鲜的第一次正面交火。袁世凯深知，中日交兵，必然牵涉外交问题，遂安排朝鲜国王在营内引见各国公使，说明事变原委，并请共同调处。后又请陈树棠与各国公使晤商调处，但调处效果甚微，竹添态度尤为强硬。后竹添返日禀告。就在竹添返日的第二天，袁世凯派兵迎接王妃和世子回宫，至此，袁世凯保护国王的目的完全达成，变乱也告一段落。袁世凯在这次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果敢受到了

了朝鲜王室的尊重，更给一直试图侵害我在朝利益的日本以警示和打击。此后，日本也因此格外担心起袁世凯。佐藤铁治郎遂对袁世凯敬畏起来，称：“袁世凯当日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速，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我日军无从措手。……袁之外交，诚有剽悍之手腕哉。”^⑧佐藤铁治郎还认为“袁久驻韩终必为患”。

袁世凯的这次果断行动，不仅让日本畏惧三分，也使他获得了李鸿章的常识。时年二十五岁的袁世凯，“竟能号召中国驻防各营，并策动朝鲜左右两营勤王，在军事上，甚至外交上作详尽周密的部署，发号施令，统驭中韩联军，击溃日军，摧毁政变集团的势力，拯救韩王，恢复李熙政权，同时维持汉城的治安，实为难能可贵”。^⑨

袁世凯因中日两国签订的《天津条约》而不得不回国。《天津条约》于光绪十一年（1885）签订，约定中日两国陆续撤退在朝之兵，袁世凯也因此随营归国。袁世凯本为纨绔子弟，朝鲜给了他施展才华

的机会，尝到了统率三军的甜头，自然不愿再回国游手好闲。所以回国后，袁世凯仍心恋朝鲜。光绪十一年（1885）秋，朝鲜大院君的归国又给了袁世凯入朝的机会。大院君是壬午之变被袁世凯等诱擒带回中国的。三年后，袁世凯又书呈李鸿章，谓：“大院君智谋才略，实胜其子数倍，颇为其国人所尊敬，且深明大义，光绪八年不得已而掳归，兹宜晓以大义，赦其回归，使其父子同心协力，于其国计颇有裨益。”^⑩李鸿章同意了袁世凯的建议，并派袁护送大院君回国。李鸿章并致书朝鲜国王，曰：袁世凯两次带兵贵邦，扶危定倾，人民信重。袁世凯也因护送大院君而得以再次入朝。半年后，也就是光绪十二年（1886）春，清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朝办事大臣。李鸿章还致书朝鲜国王，曰袁世凯“奉旨命驻汉城充办事大臣，兼襄助一切。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以商榷，必于大局有裨”。^⑪

对袁世凯多了几分敬畏的佐藤铁治郎也知道，袁世凯这次入朝，较过去大不一样了，袁世凯在朝有襄助一切的权力，犹如监国。“世凯自命其权力地位，亦在各国驻韩公使之上。遇有各国公使会议筹商务务，则派翻译唐绍仪充代，车马服从极丽，至韩官府行为，外交动作，事无大小悉加干涉，韩无一事能自主。”^⑫佐藤铁治郎甚至举例说，韩王欲换一宫内小臣，都不能自主。确如佐藤铁治郎所述，自袁世凯任驻朝办事大臣以来，中朝的宗藩关系得以进一步加强。在交往仪式上，袁世凯与朝鲜官员交往，均用平行照会；朝鲜政府遇有“公会”，袁世凯为“宾中之王”，其席位应在朝鲜官主位之上。另外，在“入贺”、“赐奠”等礼节上，朝鲜虽有不甘之心，但在袁世凯的督促下，依然延续。光绪十六年（1890）四月，朝鲜赵太妃病逝。朝鲜即向袁世凯及清廷北洋大臣禀告。按照礼节，藩属国的国王、王妃等去世，还需派遣“讣告使”到北京，向礼部告讣。然后清廷亦派使前往赐祭，并赐谥号。这次赵太妃病逝，朝鲜欲取消“大丧礼”，遂迟迟没有派“讣告使”前往北京。袁世凯则不断催促朝鲜王室，最后朝鲜只好派使前往。清廷也随即任命户部左侍郎续昌、右侍郎崇礼为致祭朝鲜国母妃正副使。

袁世凯在朝的“宗主监国”身份自然引来其他国家的嫉妒和不满，尤其是日本，本以为朝鲜可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但足智多谋的袁世凯却成了它侵吞朝鲜的绊脚石。日本始终有“而袁久驻韩终必为患”的思想，一直设法让袁世凯离开朝鲜，以除心患。日本政府曾致书驻日公使徐承祖，嘱清政府命袁世凯访问东京，与日本执政诸



▲朝鲜明成皇后，与袁世凯多有交往

臣面商一切。光绪十二年（1886）五月，袁世凯抵东京，会内阁总理伊藤博文及诸大臣。日本向袁世凯提出十二条忠告，告诫袁世凯勿损害朝鲜之自主权，宜劝朝鲜变法，以图自强，且中日两国应协力图谋。袁世凯则告诉日本政府，朝鲜非他国所能干预。伊藤博文与袁世凯的这次会谈自然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日本政府遂越发气愤，佐藤铁治郎曰：“我国当时亦无知之何。而我君臣，见清于韩种种虐待，实代不平。”^⑬

就在袁世凯与伊藤博文商谈之际，有朝鲜密求俄保护之事件发生。朝鲜密求俄保护之事件，既是一出正剧，也是一出闹剧。朝鲜求俄保护先后有两次，一次是在光绪十年底（1885初），一次是在光绪十二年（1886）夏。第一次俄朝勾结的策动者

为穆麟德。穆乃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兼外署协办，是朝鲜的改革派人物，深得朝鲜朝廷信任。穆有对朝军事、经济、交通等之改革计划，曾寻求李鸿章支持。李鸿章表示同情，但未予有力支持。穆麟德遂寻求俄国支持，并促使俄朝订立《朝俄通商章程》，极得俄人好感。甲申之变，中日交火，朝鲜甚为担心，遂在穆麟德的促使下，寻求俄之保护，并与俄定下密约，俄派舰保护朝鲜沿海，派员教练朝鲜士兵等。朝俄密约之签订立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宗主国中国自然不能答应；日本深恐朝鲜落入俄人之手，甚至危及日本本土，也不甘愿；英国也恐俄势力南下，侵占自己利益。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朝鲜不得不撤了穆麟德，朝俄密约遂成空文。朝鲜第二次与俄亲近则因诸事起。光绪十二年（1886）春夏，英国占据巨文岛，亲日派威胁甚

紧，加之袁世凯的专横，朝鲜遂萌生与俄亲近之举。朝鲜国王密召前年因海参崴密约一案而被流放的金光勋返回汉城，并命其与俄驻朝公使韦贝交往。朝俄之间再度密商保护之事。佐藤铁治郎对朝俄密商保护之起因有偏见，只说“而袁之专横，仍不稍减，卒致韩不能耐，求助于俄，数赴俄使馆密商”^④，而将英国侵占巨文岛以及日本自身的不断侵略掠夺所引发的原因都给忽略过去了。

袁世凯对于朝俄的密商非常重视，一面继续密探朝俄之动向，一面向李鸿章上书禀报。当袁世凯获知朝鲜领议政大臣沈彝泽致电俄公使韦贝请求保护的密函后，大为气愤。沈在密电中称：“敝邦偏在一隅，难独立自主，而终未免受辖他国，我大院君深为耻闷。今欲力加振兴，悉改前制，永不受他国辖制，惟不免有所忧忌。敝邦与贵国睦谊尤笃，有唇齿之势，与他国自别，深望贵大臣禀告贵政府协力默允，竭力保护，永远勿违。我大院君与天下各国一律平行，或他国有所未叶，望贵国派兵舰相助，期以妥当，深所景仰于贵国也。”^⑤袁得此密电，作出了快速反应，他一面封锁密电，设法阻止俄公使拍电报去莫斯科；一面商请英国舰队巡弋朝鲜海岸；再者，电李鸿章，请求李派兵来朝。李鸿章则因北洋兵船不足，加上军饷艰困，没有及时派兵。袁世凯不断去电催促，李鸿章遂召集周馥、盛宣怀、陈允颐等商议，并决定命陈允颐赴朝与袁密商对策，后又命袁保龄负责调拨张文宣所部设营两哨，使之改装易服，作为随陈前往巡查电路之丁役，乘利连号由大沽转往仁川，再往汉城，以防不测。此外，南北水师亦大部出动，以壮



▲伊藤博文和
朝鲜王子